

越南會安古城當代明鄉人、華人及越南人之 互動關係與文化接觸*

蔣為文**

摘要

本論文以會安古城的明鄉萃先堂、澄漢宮、福建會館、廣肇會館、潮州會館、海南會館、中華會館及會安傳統市場為觀察場域，從社會語言學及文化人類學角度探討越南會安市當代明鄉人、華人及越南人之互動關係與文化接觸。明鄉人在本土化過程中大多數均與當地越南人通婚而已越南化。相對較晚來到越南的華人則不少仍維持華人五幫的族群認同。在明鄉人與華人本土化過程中，除了受越南當地文化影響之外，華裔族群的部分文化亦保留在當地文化之中。

關鍵字：越南、會安、明鄉人、華人、文化接觸

* 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編號：NSC101-2410-H-006-078 及 NSC102-2410-H-006-036 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於論文撰寫期間正於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客座研究。感謝三尾裕子所長及相關同仁在此期間提供許多有益的資料及相關協助。另外，也感謝大阪大學的清水政明教授熱心提供相關文獻及東華大學臺越研究中心康培德主任協助田調事務。越南田調期間也承蒙許多越南友人的幫忙，他們是順化大學廖永勇老師、會安文化資產保存中心阮志中主任、自由作家 *Trương Duy Hy*、越南社科院史學所丁光海教授、會安楊先生及許多不願具名的當地報導人。此外，也感謝研究室計畫助理潘秀蓮、范玉翠薇、裴光雄、鄭垂莊、*Tân* 及小花海倫的協助。

**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及越南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自 16 世紀中葉到 18 世紀末，當時越南正屬南北分裂的時期，紛爭雙方以靈江¹為界各自統領南北方(Trần, 2002: 312; 郭振鐸、張笑梅, 2001: 459)。為增加收入，統治北方的鄭主政權(Chúa Trịnh)以「舖憲」(Phố Hiến)為貿易地，南方的阮主政權(Chúa Nguyễn)則以「會安」(Hội An)從事國際貿易。

在 15 世紀越南後黎朝出兵攻佔「占城」(Champa)前，占城治下的會安已是東南亞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之一。在阮主政權統治下的會安仍維持其國際貿易港口的特色。當時，在會安從事貿易的商人包含來自葡萄牙、大明帝國、日本、臺灣、荷蘭等地(陳荊和, 1957: 273; Trương, Đình, and Lê, 2006: 371;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1958: 32; Wheeler, 2003; 黃蘭翔, 2004; 鄭永常, 2013)。明人多數乘冬季東北季風南下到會安，再利用夏季吹西南季風時回國，因而也被當地越南人稱為 người Tàu(越南喃字寫為「人艚」)，意指「坐船來的人」。

早期會安的大明商人聚集的地方稱為「大明客庸」，後來也稱「大唐街」，均屬於臨時性之僑居地(陳荊和, 1965)。當大明帝國亡國之後，越來越多的明人為避戰亂或因不願臣服滿清而遷徙到會安。當時阮主的廣南國離滿清較遠，較無清軍入侵的壓力。因此阮主採取歡迎的態度，以期利用明人的資源以對抗鄭主及促進南疆之開拓(陳荊和, 1957: 276, 1965: 1)。鄭成功的舊屬楊彥迪及陳上川等人在此歷史背景下亦揮軍投靠到阮主之下。

依據越南阮朝官史《大南寔錄》前編卷五之記載，龍門總兵「楊彥迪」(Dương Ngạn Địch)、高雷廉總兵「陳上川」(Trần Thượng Xuyên)等人於 1679 年²率兵三千餘人投靠當時越南的阮主政權(藤原利一郎, 1949: 379; 陳荊和, 1960: 436;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1958: 32; 鄭瑞明, 1976: 25-26; 許文堂、謝奇懿, 2000: 3; Đặng, 2010: 8; Mio, 2008: 5)。阮主授予陳上川等人官職並令其負責往南方開墾，包含現今越南南部的

¹ 舊稱 Linh Giang，今稱 Sông Gianh，位於現今越南中北部的廣平省境內。

² 鄭瑞明(1976: 26)認為楊等入越時間應該是 1681 年「三藩之亂」結束以後較合理。根據越南胡志明市「明鄉嘉盛堂」(亦即明鄉會館)的介紹手冊，楊彥迪等人入越時間為 1683 年(Đặng, 2010: 8)。陳荊和(1960: 454)亦認為應在 1682 年底至 1683 年之際。

「嘉定」、「定祥」、「邊和」等地（陳荊和，1960: 437, 1968）。

阮主給予那些擬在越南落地生根的明人特典，亦即設立特別的村社組織，稱為「明香社」（Minh Hương xã）。「明香」之原義為「維持明朝香火」（陳荊和，1964: 6）。明香社的男性大多數為明人或明越混血，而女性則多為當地越南人（陳荊和，1965）。公元 1802 年阮世祖統一越南，以越南中部「順化」為首都，建立越南最後的王朝「阮朝」。阮世祖於 1807 年下令在全國設立明香社以管理明人後裔並編入戶籍。至阮聖祖即位後，於 1827 年起將「明香」改為「明鄉」，視「明鄉人」（người Minh Hương）為已入籍的越南人（陳荊和，1965: 1; 藤原利一郎，1976: 260）。

在清國期間持續仍有許多清國人民移居會安（許文堂，2012）。那些後來的移民部分選擇加入明鄉人，有些則維持華人五幫的族群認同，並以各幫會館為組織動員中心。由於明鄉人的權益優於清國商人，故清國時期才移居來越南的清人，與越南女子通婚後其後代亦多自認為明鄉人（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 41; Mio, 2008: 10）。因此明鄉人不再只是明朝香火之原義，而泛指華越通婚的後代子孫。目前，明鄉人均使用越南語且完全融入越南當地文化，其身分證件的民族類別也登記為越南主體民族「京族」（Kinh）。明鄉人就如同早期移民至臺灣的「唐山公」（Tn̄g-soaⁿ-kong）一樣。唐山公經由通婚等本土化過程，最後形成在地的臺灣人認同（蔣為文，2013）。相對於明鄉人的京族身分，華人（người Hoa），則屬於越南政府正式認定的 54 民族之一的華族。華人除了講越南語之外，大多數還會不同程度的華語（北京話）或原本的族群母語，譬如廣東話或福建話等（蔣為文，2013）。至於華僑與臺商，由於他們仍擁有中國籍或臺灣籍，沒有越南國籍，所以不列入本研究範圍內。³

位於越南中部的會安因仍保存 15 世紀以來多國貿易的文化歷史面貌，故於 1999 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可為世界遺產。本論文以會安古城的明鄉萃先堂、澄漢宮、福建會館、廣肇會館、潮州會館、海南會館、中華會館及會安傳統市場為主要觀察場域，從社會語言學及文化人類學角度探討越南會安市當代明鄉人、華人及越南人之互動關係與文化接觸，以了解明鄉人與華人在越南的本土化過程差異。本

³ 關於華人與華僑及相關用詞的討論，詳閱蔣為文（2013）。

研究的田野調查期間為 2012 年 11 月 21-23 日、2013 年 12 月 22-29 日及 2014 年 3 月 31 日-4 月 5 日。

本研究選定會安為研究範圍的理由如下：據越南於 2009 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全國共有 85,846,997 人，其中華人口為 823,071 人，約佔全國 0.96%（Tổng Cục Thống Kê, 2010）。又，依據芹澤知広（Serizawa, 2007: 66）透過胡志明市華人事務部門取得的資料，胡志明市於 1992 年共計有 524,000 名華人（約佔全市 12.5% 人口）。會安現有總人口約十二萬，其中明鄉人與華人共約二千多人左右，大約佔全市 2%。⁴相較於胡志明市的較高華人比例，會安較接近全越南的華人佔越南總人口的比例。此外，因會安的人口與空間範圍較小，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下較容易從事田野調查。

二、古街的歷史及空間分布

會安古城裡與明鄉人或華人相關的建築物現今大部分都分布在「陳富」（Trần Phú）街及周遭的路上（參閱圖 1）。以陳富為主的周遭區域也是目前國內外旅客最聚集的觀光地區。陳富街就是早期明人聚集的大唐街，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該街稱為日本街。⁵近代越南共產黨統一全國後才改為陳富街。陳富為越南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1930.10-1931.09）。由此可看出越南共產黨對明鄉／華人及越中關係的立場。

明鄉會館及華人五幫會館主要分布在陳富街上。地圖上，由右而左分別為潮州會館、瓊府會館（海南）、明鄉萃先堂、澄漢宮（關公廟）、明鄉佛寺（現改為會安歷史文物館）、福建會館、中華會館（五幫）、廣東會館、日本橋及錦鋪鄉賢亭（明鄉）。會安華人五幫裡頭唯一沒有自己的會館的是「嘉應幫」。⁶另外，由明鄉人設立的文聖廟則位於隔一條街的「潘周楨」（Phan Chu Trinh）街上。

⁴ 由於越南 2009 年的人口普查統計表僅載明各民族的全國總人數，沒有各地地方的人口明細，此比例係依據作者訪問結果支粗估。依據作者於會安當地對明鄉人、華人及越南人訪問所得大約數值，現有華人約二千上下左右（含大人與小孩），明鄉人僅約數百人（不含那些完全越南化、不知道自己是明鄉人後代的明鄉人）。

⁵ 因街尾有一座日本橋。

⁶ 依照在會安各會館發現的碑文、牌匾或對聯，「嘉應幫」是最常使用的頭銜，而非目前臺灣常用的「客家人」用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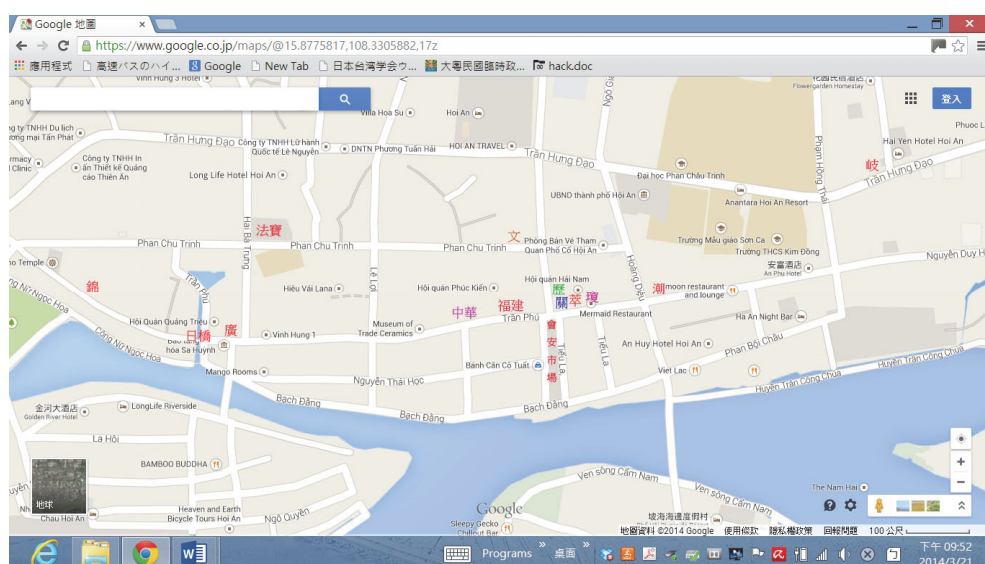


圖 1、會安古城明鄉人與華人相關建築物之分布

簡稱說明：錦：錦鋪鄉賢（亭）；日橋：日本橋；廣：廣肇會館；法寶：法寶寺；中華：中華會館／禮義學校；福建：福建會館；文：文聖廟；歷：會安歷史文物館／明鄉佛寺；關：澄漢宮（關公廟）；萃：明鄉萃先堂；瓊：瓊府會館；潮：潮州會館；岐：周岐山墳墓。

資料來源：作者依田調結果利用 Google Map 繪出。。

會安明鄉人十大老之首的「孔天如」（Khổng Thiên Như）的墳墓則位於潘周楨街與「仁婆徵」（Hai Bà Trưng）交叉口的法寶寺園區裡頭。另一位十大老「周岐山」（Chu Kỳ Sơn）的墳墓則位於陳興道（Trần Hưng Đạo）路上的一條小巷子裡頭。此外，在古街北邊較外圍的孫德勝路上的「祝聖寺」（Chùa Chúc Thánh）為來自大明國福建泉州的「明海」和尚所創立。祝聖寺園內也有不少明鄉人、華人及越南人的墳墓。譬如，對創建明鄉萃先堂有貢獻的「惠鴻大師」及「鄭門吳氏」（法名：妙成）及三家之一的張姓的部分後代亦葬於此。在祝聖寺的斜對面是華僑抗日烈士紀念碑、「清明祠」及「萬善同歸」華人墓區。就筆者觀察到的墳墓來看，華人（不論早期或近期）及早期明鄉人的墓碑主要以漢字書寫，近期（約 1940 年代以後）的明鄉人後代與越南人的墓碑則主要為越南羅馬字書寫，其中也有漢字和越南羅馬字併用的情形。這個現象也反映出明鄉人越南化及越南語從漢字轉為羅馬字書寫的歷史背景。



圖 2、近期明鄉人的墓碑多數已改為以羅馬字書寫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與陳富街平行、在其南邊的下一條街目前稱為「阮太學」街（Nguyễn Thái Học）。阮太學街在法國時期稱為廣東街。從阮太學街再往南則是靠河岸的白藤街（Bạch Đằng）。會安古街早期以陳富街為主，後來因為河沙淤積才陸續堆積出阮太學街及「白藤街」（葉傳華，1962）。這三條古街都曾是明鄉／華人聚集的街道。由於 1975 年越共解放南越及 1979 年越中邊境衝突，越南排華政策導致大量華人移居到海外。目前仍居住在會安古街的華人則已相當稀少。

三、明鄉萃先堂與澄漢宮

「明鄉萃先堂」（Minh Hương Tụy Tiên Đường，以下簡稱萃先堂），地址位於陳富路 14 號。⁷萃先堂是目前會安地區仍有明鄉人出入、具代表性、較大的明鄉會館。萃先堂的最早建立的具體年代仍有不同說法。即使萃先堂內部對建立年代也無一致的說法。依據擺在萃先堂門口供遊客閱覽的木製介紹看版，內容寫著約建立於 18 世紀末期。⁸但建築

⁷ 14 Trần Phú.

⁸ 作者於 2012 年及 2013 年底前往調查時所見之看板。

物裡面的「史略」(Lược sử)簡介看板則又記載於1820年建立。若依萃先堂正殿左側(面向外)，於越南「維新」二年(1908)所立的碑文記載內容：「明命初元建前賢祠額曰萃先堂……成泰十七年卜遷于澄漢宮之左……」。越南「明命」皇帝元年即為1820年，「成泰」十七年即為1905年。若該碑文紀錄無誤，萃先堂應建於1820年，後來才於1905年遷到目前的位置。

依據日本學者三尾裕子(Mio, 2008: 9)的研究，萃先堂建立年代應當在「明香社」正式改為「明鄉社」之際的1827年左右。由於明鄉人可以享有較華僑優惠的稅率，且免除一般越南人需服兵役與勞役的義務，故從先前的中華會館及福建會館獨立出來建館有其保有明鄉人獨特身分的好處。中國學者李慶新(2009: 211)則認為應是1653年，他指出：「2001年，筆者前往會安考察，在明鄉萃先堂，發現有『慶德癸巳年』供奉『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的牌匾」。李慶新依此牌匾認定萃先堂的建立年代。其實，此牌匾應該是隔壁澄漢宮所屬。依照陳荊和(Chen, 1960: 18)報導，這個牌匾位於澄漢宮裡。此外，筆者於2012年及2013年前往調查時，該牌匾確實也是在澄漢宮。

該牌匾非萃先堂所屬的主要理由有三點：早期明鄉會館主要供奉祖先，其次才是供奉神明。該牌匾的內容與關公信仰較符合。第二，依維新二年所立的碑文記載應建立於1820年代。該年代與李慶新主張的1653年相差達167年，似乎不太可能。第三，經筆者與萃先堂的管理委員會主委曾川先生訪問，確認他管理萃先堂期間未曾見過該牌匾放置於堂內。

萃先堂主要祭拜明鄉人祖先「十大老」(Thập Đại Lão)、「六姓」(Lục Tánh)及「三家」(Tam Gia)、歷年明鄉社幹部及對建立萃先堂有功之士，其次才祭拜神明。不少研究者對於十大老、六姓及三家的認知有所誤解。這些誤解主要來自於主殿的神主牌位及維新二年的碑文的誤導。譬如，李慶新(2009: 215)認為「正堂祀『明鄉歷代先賢』，其中鄉官祀『十大老』，這是會安明香社的開山之祖。鄉老祀許、魏、吳、伍、莊、邵六人。鄉長祀吳廷寬、冼國詳、張弘基……」。譚志詞(2005: 44)則指出「他們分屬魏、吳、許、伍、莊六個姓氏，明香人稱此十位創始人為『十老』或『前賢』」。黃蘭翔(2004: 171)也表示「會安的明鄉人的祖先是魏、莊、吳、邵、許、伍等六姓的十大老，及後來

的三大家冢國公、吳廷公、張弘公等明朝舊臣遺民之後代子孫」。

依據上述維新二年碑文內容記載：

……魏莊吳邵許伍十大老者 明舊臣也 明祚既遷心不肯貳遂隱其官銜名字避地而南至則人唐人在南者冠以明字存國號也卅六省皆有所立而廣南始焉初居茶饒⁹尋遷會安相川原之勝通山海之利……十大老既往¹⁰ 三大家繼之曰 冢國公 吳廷公 張弘公¹¹……

由於碑文以文言文書寫「……魏莊吳邵許伍十大老者……」。一般都會解讀為「魏莊吳邵許伍」等六姓就是十大老。究竟是碑文撰寫者「張同洽」撰寫有誤或確實是如此？筆者比對陳荊和的中文（陳荊和，1957: 282）及越文（Chen, 1960: 21）論文發現，在其中文論文裡僅提及十大老及三家，但越南文論文裡卻引用李誠意於 1880 年撰寫的《萃先堂前鄉賢譜圖板》之記載明確指出十大老、六姓及三家為不同階段的三批人。中文版與越文版不一致的現象甚是奇怪。或許在陳荊和之後的中文學者僅閱讀陳的中文論文，故均把十大老及六姓混為一起。

經由筆者與報導人 F（明鄉人）、G（明鄉人）及 Trương Duy Hy（男，82 歲，明鄉人）的訪談及報導人提供的越南文資料顯示，十大老、六姓及三家的解讀應如下所述較可靠：

十大老、六姓及三家是歷史上不同階段來到廣南的明人。依據 Trương Duy Hy（1999: 9）的論文，第一階段約 1644 年，這些人被稱為十大老，包含孔（Khổng¹²）、顏（Nhan）、余（Dư）、徐（Tù）、周（Chu）、黃（Hoàng）、張（Trương）、陳（Trần）、蔡（Thái）、劉（Lưu）等十個姓氏。¹³或許因為十大老剛來越南時仍屬高度危險期，為避免滿清追殺，故僅保留姓氏、不記真實全名。第二階段約 1650 年，

⁹ 茶饒（Trà Nhiêu）位於秋盆河和長江兩大河的下游交會處，離會安古城約 3 公里。

¹⁰ 既往意思與「往」相同，過往、去世之意。

¹¹ 碑文以「冢國公」、「吳廷公」及「張弘公」的尊稱方式稱呼三大家。若依照正殿所奉祀的神主牌的記載，全名為「冢國詳」、「吳廷寬」及「張弘基」。

¹² 有的資料寫 Khổng thái（孔太）；加上 thái 是特別尊稱的意思（Chen, 1960: 21-22）。

¹³ 筆者於 2014 年 4 月 3 日特別拜訪 Trương Duy Hy 先生以了解其論文依據的資料來源。他表示，該主張係根據萃先堂內部管理人員流傳使用、以越南文書寫的《明鄉三保務》（Minh Hương Tam Bảo Vụ）手冊記載的內容。

包含魏 (Nguy)、莊 (Trang)、吳 (Ngô)、邵 (Thiệu)、許 (Hứa)、伍 (Ngũ) 等六姓氏，故稱為六姓。第三階段 (原文未註明年代¹⁴) 為「洗國詳」、「吳廷寬」及「張弘基」等三人。第四階段亦未註明年代，為包含鄭、林、丁、馮、尤、丘、黎、鳳等八人。自此階段起，此八人沒有特別稱呼。此上共計 27 人，其中十大老被尊稱為「前賢」，其餘則尊稱為「後賢」。至於神主牌上左右兩側所寫的「鄉官」、「鄉老」及「鄉長」，並不是分別指十大老、六姓及三家，而是另有他人。依據報導人提供的一份越文版《萃先堂前鄉賢譜圖板》，¹⁵該圖譜列出鄉官共 57 人、鄉老共 19 人、鄉長共 61 人 (Lý, 1880)。



圖 3、萃先堂主殿的神主牌位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雖然傳統上萃先堂的主要功能並非祭拜神明，但隨著會安獲選為世界遺產、觀光客日益增多，此傳統已開始改變。筆者於 2012 年及 2013 年前往調查時發現萃先堂已於入門的前殿新增五尊神明雕像：進門面向

¹⁴ 但依報導人 F 及 G 表示，三家大約比六姓晚 40 餘年才來。意即，約 17 世紀末期。

¹⁵ 該越文 (羅馬字) 版譯者為 Tổng Quốc Hưng，有註明原稿由 Lý Thành Ý (李誠意) 於 1880 年編寫而成。由於筆者沒有漢文原稿，「萃先堂前鄉賢譜圖板」及李誠意為本論文筆者根據陳荊和 (Chen, 1960: 21) 轉述的漢字原文。

神明由左到右分別為「金花娘娘」、「天后聖母」、「藥王本頭公」、「保生大帝」、「福德正神」。依據報導人 I（65 歲，京族人，在萃先堂協助雜務）的表示，擺設神明主要目的是增加經濟（油香錢）收入以維持萃先堂的營運。雖然萃先堂有加入「會安文化與體育中心」發行的古蹟參觀收費門票行列，但門票的收入仍然有限。¹⁶ 依據他們實際運作的結果是遊客的香油錢比門票收入還多。因此，祭拜神明有吸引遊客添油香的經濟考量。具管理委員會委員身分的報導人 F 表示，以前這些神明只有牌位，放在主殿連同其他明鄉人的前賢、後賢一同供奉。大約 2011 年起才將神明牌位改為雕像並移到入口處，以吸引觀光客。F 表示，早期各明鄉社會分工擇一主要的神明祭祀，萃先堂主要是祀奉藥王本頭公。

依據報導人 I 的自我認知：「藥王本頭公、保生大帝及天后聖母是明鄉人的信仰，但關公則是華人的信仰。目前，當地僅有明鄉人仍祭拜藥王本頭公及保生大帝。天后聖母則明鄉人與華人均有祭拜。福德正神在當地代表財神，可以保佑商家發大財」。至於金花娘娘，報導人 I 表示，那是別的供奉處因要拆建大樓而遷移到萃先堂。

報導人 I 的認知是否適用於全國或僅會安的明鄉人案例，或僅是他個人的認知？有待進一步調查。但某種程度也反映出當地京族人對這些神明信仰的某種看法。就筆者在越南各地華人地區所做的觀察，祭拜關公可算是最普遍的華人民間信仰，其次才是天后聖母的祭拜。或許由於關公在中國歷史上具全國性知名度，且其講求義氣的特質正符合華人新移民的需求，故其普及度較高。雖然報導人 I 認為關公並非明鄉人的信仰，但其實位於萃先堂隔壁、祭拜關公的「澄漢宮」最初就是由明鄉人建立的。或許隨著逐漸越南化及與華人的互動越來越少後，明鄉人逐漸淡出關公信仰，以至於會有報導人 I 這樣的認知。

明鄉人與五幫華人間的互動往來或許可從碑文及雙方互贈的牌匾、對聯中看出端倪。一般來說，明鄉人會使用虛構的「龍飛」年號或越南皇帝的年號；尚未越南化的華人則採用中國的年號。萃先堂內的重修碑文共有三份，¹⁷ 均用越南年號，分別是嗣德 28 年（公元 1875 年）、維新

¹⁶ 會安文化與體育中心的越文原文為 TRUNG TÂM VĂN HÓA - THỂ THAO THÀNH PHỐ HỘI AN。

¹⁷ 關於數量單位「份」：若同碑文太長而分別刻在幾塊石碑，仍算一份碑文。

2 年（1908 年）及保大 18 年（1943 年）。三份碑文均為明鄉人所立且內容記載捐錢整修者也多數是明鄉人。但其中也記錄五幫華人有參與捐錢整修。譬如，嗣德 28 年的碑文寫著「四幫 錢十貫」。¹⁸至於錢十貫的金額究竟有多大？若參照碑文其他明鄉人的捐款額度，約相當於一位明鄉鄉長或秀才的額度。另外，保大 18 年的碑文亦記載「并五幫城庸紳豪信女樂供」等字樣，亦顯示少部分五幫華人亦曾捐款重修。維新 2 年的碑文亦記載萃先堂移建之初有華人婦女鄭門吳氏捐贈大片土地。¹⁹

除了碑文之外，萃先堂也有一份署名「五幫眾商」敬送的「明德惟馨」牌匾，該牌匾寫著「中華民國拾貳年」（1923 年）。之後，直到 2009 年才有署名福建會館敬送的對聯及廣肇會館敬送的燈籠。由上述這些史料看來，萃先堂的明鄉人雖於 19 世紀及 20 世紀前半期仍有與較晚移居會安的華人往來，但其程度與關係已不高。在 1943 年至 2009 年之間的來往則可說是幾近於零。直到近年由於會安古城成為國際觀光文化景點，萃先堂才與人氣較旺的福建會館及廣肇會館有禮貌性的贈送紀念品。依據報導人 F 表示，以他為例，雖然他的親戚家屬裡面有人嫁給華人，但整體而言明鄉人與越南京族的密切往來遠大於華人。

萃先堂於 1993 年獲越南政府認可為歷史文化古蹟，並於 2002 年至 2009 年間接受越南政府補助重新整修。依據報導人 F（祖籍福建泉州，來越第 10 代，完全不懂漢字也不懂泉州話）的說法，以萃先堂為聯繫中心的明鄉人於 1945 年戰後曾蕭寂半個世紀，直到 2009 年整修完畢開放參觀後才在政府主動動員下找回現有的明鄉人擔任會館的自治管理工作。由於長達半世紀的失聯，目前成員人數不如以往之多。²⁰現今仍有來往者大約幾百人左右，多數是在萃先堂辦理祭祀活動（以越南語進行）時才會出現。報導人 F 表示，農曆 2 月 12 日的春祭活動為全年最大活動。春祭主要是祭拜前賢後賢並辦理聯誼活動以聯繫會員感情。依照 F 提供

¹⁸ 究竟缺少哪一幫，仍有待考察。應該是相對人數較少與較晚到的海南或嘉應（客家）其中一幫。

¹⁹ 維新 2 年的碑文沒有記錄鄭門吳氏為華人婦女，但依據位於祝聖寺園區內的鄭門吳氏墳墓石誌記載，她為華族之女。該石誌由明鄉社於嗣德 7 年（1853）立。

²⁰ 萃先堂的組織似乎相當鬆散。依據報導人 F 的說法，他們是以家庭為單位來聯繫成員。目前會安地區約有 250 個明鄉家庭。有活動時會寄邀請函給他們。成員的認定則通常依其姓氏、居住的地點及透過認識的明鄉人的介紹等方式來做判斷。

的 2014 年春祭照片來看，該次活動約近百人參加，內容有（1）祭祀儀式；（2）向老人祝壽；（3）抽獎；（4）發米救濟貧民。至於活動期間之外，平時只有少數幾位幹部輪流值班及觀光客（外國遊客居多）會前來參觀。與鄰近的福建會館及廣肇會館相比，在筆者田調期間來參觀萃先堂的遊客並不多。此外，由於過去長期沒有活動，在訪談過程中明鄉報導人對明鄉人的歷史記憶幾乎都是從近年出版的書籍資料從新擷取、建構而來。

隨著明鄉人的越南化演變，萃先堂擔任凝聚明鄉人意識的重要集會場所的角色已不如往昔那般重要與迫切。在會安古城獲選世界遺址之後，萃先堂所能扮演的角色似乎已轉型成為具越南特色的歷史文化觀光資產之一。相較於其他華人的會館需自籌營運經費，或許這也是為什麼明鄉人的會館受越南政府青睞、可獲補助的主要原因。

在萃先堂拜訪期間，報導人 G（祖籍福建泉州，來越第 11 代，完全不懂漢字也不懂泉州話）提供了一份家藏的土地移轉契約。該契約用漢字書寫，最初訂立時間為越南嘉隆帝 9 年（*Gia Long*, 公元 1810 年），中途移轉兩次，分別為嘉隆 10 年及 16 年（1817 年）。在這段期間契約均用「明香社」一詞。到了最後贖回時為成泰 16 年（公元 1904 年），此時已改用「明鄉社」用詞。此契約剛好可看出「明香社」轉換為「明鄉社」的過程。

「澄漢宮」²¹又稱為關公廟，位於陳富街 24 號，就在會安市場的對面。關於澄漢宮的成立年代，一般都以廟內的勒封牌匾上所記錄的「慶德癸巳年冬季」推論為 1653 年或更早之前建立。澄漢宮最早為明鄉人建立（*Chen, 1962: 25*）。依據報導人 F 表示，澄漢宮原本為萃先堂明鄉人所有。但南北越統一解放後澄漢宮及萃先堂曾一度被收為國有。待越共改革開放後才將萃先堂歸還明鄉人自主管理。但澄漢宮未在歸還之列，仍由國家管理，主因是其信眾頗多且香油錢收入可觀。據報導人 F（明鄉人）及 J（華人第三代，1969 年會安出生）表示，目前澄漢宮關公廟的信眾包含越南人、明鄉人與華人。由於澄漢宮位於會安傳統市場的正對面，如果有買賣糾紛出現，許多案例均會到澄漢宮尋求關公做公親以解決紛爭。

²¹ 越南文可稱為 *Chùa Ông, Quan Công Miếu* 或 *Trùng Hán Cung*。

位於澄漢宮裡面的石碑有五份，最古的二份均用「龍飛」年號，其次分別為「明命 8 年」（1827）、「嗣德 17 年」（1863）及「成泰 16 年」（1904）。可見負責重建整修的主要都是明鄉人。另外，澄漢宮裡面也有許多信眾敬贈的牌匾或對聯。其年號之採用有越南年號、中國年號或僅註明干支紀年。若署名「五幫」或各幫幫名的牌匾或對聯均採用中國皇帝年號，其中以光緒（1875-1909）年號最多、其次為同治（1862-1875）及嘉慶（1796-1821）。在澄漢宮也發現有署名「嘉應幫」的客家人於光緒甲辰年（1904）敬送的牌匾。²²由此可看出華人最密切往來於澄漢宮的時期為 19 世紀後半期到 20 世紀初。之後，信眾中的華人或許因為逐漸越南化而成為新的明鄉人，或因為排華期間陸續移居海外，或因華人在廣肇會館另起爐灶祭拜關公，而逐漸不突顯華人色彩。

在澄漢宮後面，門口面向阮惠（Nguyễn Huệ）街的「明鄉佛寺」²³與澄漢宮約在同一時間興建（Chen, 1962: 25）。明鄉佛寺原本也是明鄉人興建，現已改由政府接管並改建為會安歷史文物館。²⁴

四、華人的會館與文化接觸

（一）福建會館

福建會館位於陳富路 46 號，是目前會安地區佔地最廣、建築最輝煌與香火最鼎盛的媽祖廟與華人會館。依據福建會館內存二份分別在乾隆丁丑年（1757）及 1974 年的重修碑文，可知福建會館最初為約 1690 年代興建的草廟（當時稱金山寺），主要供奉媽祖。後來於 1757 年由福建幫出資改建為瓦廟（新稱為「閩商會館」），於 1849 年再增建後殿供奉六姓王爺公，最後於 1895 年動工至 1900 年完工才有今日的規模。

福建會館主殿奉祀「媽祖」，²⁵後殿則供奉「六姓王爺公」、²⁶「金花娘娘」²⁷與「財神爺」²⁸。據報導人 F 表示，這裡的六姓王爺公並非萃

²² 依據報導人 J 表示，目前（2014 年）會安的嘉應幫僅剩幫主一人，其餘成員都移居他地了。

²³ 越南語稱為 Chùa Bà 或 Chùa Quan Âm。

²⁴ 越南語稱為 Nhà Trưng Bày Lịch Sử - Văn Hóa Hội An。

²⁵ 越南語稱為 Bà Thiên Hậu Thánh Mẫu（天后聖母）。

²⁶ 越南語稱為 Lục Tánh Vương Gia。

²⁷ 越南語稱為 Kim Hoa Nương Nương。

先堂祭拜的六姓。經筆者向會館的人員詢問，他們也表示僅知道六姓王爺公是當初反清復明的六位將軍。後殿的六姓王爺公神像分別用漢字寫著「欽王爺」、「張王爺」、「舜王爺」、「朱王爺」、「十三王爺」及「黃王爺」等六位王爺。金花娘娘則包含三位 Bà Chúa Sinh Thai 及十二位 Bà Mụ，主要為生育之女神，主管婦女的懷孕與生產。財神爺則主管生財致富。據報導人 J（男，48 歲，越南出生，潮州來越第三代）表示，該館每年農曆 2 月 16 日祭拜六姓王爺，2 月 1 日拜金花娘娘及 3 月 23 日媽祖生為全館三大活動，其中祭拜六姓王爺為最熱鬧、人數最多的活動。據報導人 J 表示，雖然福建會館目前為華人管理的會館，但仍有許多當地的越南人來此祭拜以求子或求財。

雖然福建會館最早為明鄉人建立，但後來逐漸由相對「新客」掌控主導權，形成目前以華人為主導的會館。這個現象可從館內的碑文、牌匾及對聯得到應證。這些文物採用的年號包含龍飛、越南、中國年號、公元及干支紀元都有。其中，以中國年號最多。龍飛年號僅出現一次，是在後殿上方的桁柱上，寫著「龍飛歲次己酉年仲秋吉日福建幫幫長總理福首船長眾商全興」。從署名來看，應該是當時相對於「舊客」明鄉人以外的新客——在越從事貿易的清人或華人所捐贈。至於那些商人為何跟隨明鄉人採用龍飛年號？由於後殿是於 1895 年至 1900 年間興建，除非該桁柱是回收舊材使用，否則應該是後殿興建時新造的才對。若是新造，為何仍採用龍飛？當時大明國滅亡已二百多年，不太需要隱藏明人後代之身分。或許「龍飛」已成為一種海外明人及其後代的精神象徵，故後來的新客為表示對舊客義行的欽佩而刻意採用象徵性的年號。龍飛桁柱旁邊有另外二支桁柱，分別寫著「光緒乙未年四月吉旦福建幫幫長總理眾商全重修」及「公元一九七五年 歲次乙卯孟春吉旦 福建同人重修」。光緒乙未年剛好是動工增建後殿的 1895 年。

越南年號在此會館出現二次。第一次是嗣德 4 年（1851）由右而左寫著「德配天」的牌匾，左邊署名「金山廟重修誌慶 明鄉信善族全奉供」。據會館碑文記載，1757 年以後金山寺已改為閩商會館。由此牌匾可見，在明鄉人心目中該館做為金山寺的角色遠大閩商會館。另外一份牌匾左邊註明「啟定三年冬月吉日御製」（1918），右上角寫著「勅賜」小字，

²⁸ 越南語稱為 Thần Tài Công。

中間寫著「好義可嘉」四大字。一般來說，勅賜是指皇帝賞賜。「好義可嘉」是否啟定皇帝賞賜？又，針對誰嘉其義行呢？是否六姓王爺公或媽祖？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考察。

館內文物的中國年號以光緒（1875-1909）年間最多，極少部分也有用中華民國，但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年號。最早的年號是位於後殿牆壁上的一塊於乾隆丁丑年（1757）由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施澤宏」所立的碑文。由這些文物的年號可看出福建會館和澄漢宮一樣，於 19 世紀後半期到 20 世紀初是最多清人／華人信眾的時期。福建會館自建廟之初，似乎都是由新客具主導力量。那些逐漸越南化的舊客逐漸變成明鄉人或越南人，因而脫離福建會館另立萃先堂或其他以明鄉人為主導的團體。也因福建會館一直以新客為主，才形成目前以福建幫華人為主導的華人會館。另一方面，因福建會館不是單純的同鄉會館而已，同時也是具有歷史悠久的廟宇的宗教信仰成分，故能吸引當地不分族群的大眾前來參拜。

館內的公元紀年多出現在戰後，特別是越共改革開放的 1990 年代之後。其中很多都是已移居海外的華人所捐獻的紀念物。其他的華人會館也都有這種類似的情形，其中以福建會館及廣肇會館的海外捐贈物最多。這些均反映出越南排華期間華人再度移民他鄉的現象。

雖然福建會館在當地是最興旺的會館與廟宇，福建話（咱人話）在當地是否普遍被使用呢？答案是：沒有。筆者於 2013 年 12 月在會館內曾以臺語測試當時負責排班顧櫃臺的幾位福建裔人員，他們均聽不懂。他們之間的交談均以越南語為主。其中有一位（男，56 歲，來越第五代）懂一點華語。他說小時候曾在中華會館的禮義學校學過中文。之後在另外的場合（2014 年 4 月），筆者在訪問到二位懂福建話的報導人。報導人 K 年齡 81 歲，越南出生，來越第四代，父親祖籍福建泉州晉江，母親客家人。K 目前是某會館的重要幹部。筆者用臺語及臺灣華語與 K 做一般會話交談，基本上都沒有溝通困難。K 在小時候曾於福建會館開辦的「福建學堂」上課。K 表示，當時福建學堂用福建話及華語雙語上課，學生約有 100 餘位。基本上，課文用華語唸，但老師用福建話講解。該學堂於 1940 年代前開辦，之後就沒有繼續了。K 的太太也是福建人後代，兩人共育有五男一女。其中只有一男懂華語，其餘均不懂福建話。據 K 表示，目前全會安大概只有十幾位 80 歲以上的福建人後代還懂福建話。

另外，報導人 L，當地著名的書法家，今年 86 歲，越南出生，福建移民第二代。筆者用臺語與他溝通也無問題。L 表示他小時後也在福建學堂上課，他對學堂的陳述與 K 一致。因他是移民第二代，故小時候在家均用福建話。

（二）中華會館

中華會館位於陳富路 64 號。中華會館的最初興建年代大約介於 1715 年至 1741 年之間（Chen, 1962: 37-40），早期稱為「洋商會館」，作為各幫未有自己的會館前的綜合性會館。於中華民國建立後始稱為中華會館，目前當地人俗稱它為 *Hội quán Ngũ Bang*（五幫會館）或 *Chùa Bà*（媽祖廟）。

中華會館正殿供奉媽祖，是早期華商重要的宗教信仰中心。但依筆者現場觀察，目前平常來此拜拜的香客似乎遠不如福建會館。由此可知，當今中華會館做為統合華人五幫的精神堡壘遠高於媽祖廟的功能。據報導人 J 表示，該館每年農曆正月初二的春節晚會及 3 月 23 日媽祖生是全館也是全五幫最大活動，當天各幫成員都會來參加。活動期間使用的語言有越南語及華語。此外，中華會館也附屬當地華人慣稱的「禮義學校」。²⁹由於越南政府不准會館以學校名義開課，故其正式名稱為補習班性質的「禮義華文中心」。³⁰據報導人 J 及禮儀學校 M 老師表示，目前周六、日有開設小學生的華語課程，約數十學生上課。週間的晚上有成人的華語班，約近百人上課。成人班九成以上都是因商業需求而來補習華語的越南人。

中華會館的入口處牆壁上有掛著 1940 年代因抗日犧牲的 13 位華人烈士照片。目前這些烈士的遺骸均集中葬在祝聖寺斜對面的抗日烈士紀念碑。³¹其中有一位烈士「羅允正」（1920-1945）特別值得一提。羅允正為會安大望族羅錦華（1819-1906）的孫子，於 1920 年出生於會安，祖籍廣東東莞，算是來越第三代（劉陳石草 2013: 41-46）。他對音樂特別有興趣與天份。他生前曾創作一首樂曲《Printemps et Jeunesse》。

²⁹ 最初稱為「中華公學校」，採用中華民國的國語（華語）教材。目前的禮義學校及成人華語班則採用北京出版的教材。

³⁰ 越南文稱為 *Trung Tâm Hoa Văn Lễ Nghĩa*。

³¹ 其中有一位烈士遺骸由家屬領回自葬。

在羅允正參與抗日而受難後，該曲分別由會安華人「葉傳華」譜上中文歌詞《青年與春天》及越南詩人 Thê Lữ 譜上越語歌詞「Xuân và tuổi trẻ」。該中文版《青年與春天》成為會安華人普遍傳唱之歌曲，越文版歌曲在全越南也頗具知名度。羅允正的族群身分相當特殊：對華人而言，他是不折不扣的華人，甚至因為有祖國認同才會參與抗日救中國的活動。對當地明鄉人來說，羅允正也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明鄉人的一份子。筆者拜訪明鄉人後代 Trương Duy Hy 期間，Trương Duy Hy 提供一份他正在撰寫關於會安明鄉人物誌的草稿，其中也包含了羅允正。Trương Duy Hy 以羅允正的越南語筆名 La Hối 來介紹他出生於會安的明鄉社。

由此案例可看出舊客（明鄉人）與新客（華人）之間有一過渡期為明鄉、華人雙重身分認同。過渡期間，有人仍維持華人認同，有人則往明鄉認同靠攏。這種雙重認同在萃先堂也發現一個案例。報導人 G（祖籍福建泉州，來越第 11 代，完全不懂漢字也不懂泉州話）雖然是萃先堂的主要幹部之一，但他也偶而出入福建會館。一般來說，影響族群認同的因素可分為主觀與客觀二大方面。個人的自我認同屬於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則包含血緣、語言、居住地及風俗習慣等各種有利於區分族群的外在特徵。除了這些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催化因素，就是族群政策。當某人同時擁有成為華人或明鄉人的條件時，是什麼因素會強化他選擇某特定族群的身分？依據筆者觀察與訪問越南華人與明鄉人的結果來看：父母是華、越通婚且自己出生於越南的華人及其後代仍維持強烈中國祖國意識者其實是相對的少數。即使是在同一個大家族裡，不同成員也有不同的族群認同，而中國祖國認同者經常是少數。通常那些經濟收入較富裕的男性成員維持華人認同的比例也較高。而經濟收入普通或較差的成員則逐漸加入明鄉人行列。中國有俗語說「衣錦還鄉、落葉歸根」。那些一開始到越南經商的華人，如果事業有成，經常會往返僑居地及中國原鄉之間，因而與祖國維持濃厚認同關係。至於那些生活條件相對較差者為了改善環境，就傾向選擇明鄉人的身份。因具明鄉人身份可減免稅金並和越南人一樣具有擔任公職的基本資格。

（三）廣肇會館

廣肇會館位於陳富街 176 號。依據該館現存載明中華民國 53 年所立

的「會安廣肇會館重修簡誌」碑文所陳述，廣肇會館建立於光緒 11 年（1885）。廣肇會館主祀關聖大帝，其兩側為天后聖母及財帛星君。

廣肇會館館內的文物年號以光緒年間最多，少部分有公元及中華民國年號。此外，廣肇會館與福建會館一樣，有一份勅賜「好義可嘉」匾額，左邊註明「啟定三年十月吉日」（1918）。除了這份之外，沒發現其他明鄉人送的牌匾。另外較特殊的現象是在本館內僅有海南眾商送的牌匾，沒發現署名其他各幫的牌匾或對聯。

（四）潮州會館

潮州會館位於陳富街另一頭的「阮維效」街 362 號。³²依據該館內一份於咸豐 2 年（1852）所立的題有「福緣善慶」標題的碑文，內文記載潮州會館興建於道光乙巳年，亦即 1845 年。

潮州會館主祀伏波將軍，亦即東漢時期曾帶軍攻打越南的「馬援」。由於馬援曾鎮壓越南的民族女英雄二徵夫人起義，因此 1975 年越共解放南越後曾將潮州會館關閉。直到改革開放後才又重新開放該會館。筆者曾訪問幾位當地潮州人後代，但他們對於為何會館會祭祀伏波將軍的歷史源由均不清楚。筆者又訪問住在潮州會館附近的越南人，他們均知道潮州會館曾因祭拜攻打越南的馬援而被關閉過，但其他細節則不清楚。目前，潮州會館是五個華人會館裡遊客參觀較少的一個。來此會館祭拜者主要為潮州籍華人，無越南人。

（五）瓊府會館

瓊府會館位於陳富街 10 號，就在萃先堂的隔壁。瓊府會館約建立於 1875 年至 1891 年之間。³³瓊府會館主殿為「昭應殿」，奉祀 108 位於 1851 年在越南中部外海遭不肖越方海巡人員栽贓搶劫而罹難的海南籍商人。

³² 阮維效的越南文為 Nguyễn Duy Hiệu。有些資料寫位於阮維效街 157 號。經實地訪問，157 為舊的門牌號碼。

³³ 依據館內「瓊府會館重修碑誌」（中華民國 63 年立）及「瓊府會館碑記」（光緒壬寅年仲冬）均記載會館創建於「光緒初年」。由於光緒「初年」可能是「元年」（1875）或稍後的幾年，故應當建於 1875 年之後。又，經查看館內文物，出現最早的年號是光緒 17 年（1891）的一份銅鐘，反而不見光緒元年的文物。故，筆者推測該館建館年間應在 1875 及 1891 年之間。

該館除了主祀 108 昭應公之外，其次也為財帛星君及福德正神。每年農曆 6 月 15 日祭拜 108 昭應公為全館最主要活動。來此會館祭拜者主要為海南籍華人。在筆者訪視會館期間（2013 年 12 月），巧遇一群越南國中女生來此參觀及拜拜。筆者特別訪問她們為何來此會館。她們說因為覺得該會館很漂亮就進來參觀並順便拜拜。至於她們拜的是什麼樣的神明則不是很清楚。

瓊府會館平時的當地香客並不多，偶而有遊客來參觀。該會館將門口大廳的地方出租給一位越南人 M（男，京族人，約 40 歲）販賣紀念品。報導人 M 說平時海南人很少來此會館，主要在祭拜昭應公及祭拜祖先（農曆 1 月 2 日）時才會出現。全會安大約還有三百人左右的海南人。報導人 M 在會館紀念品販賣處有販售十二生肖紀念幸運幣。傳統上，越南與中國有一個生肖動物不一樣，那就是兔子與貓。在越南，貓取代兔子成為十二生肖之一。報導人 M 依照越南習俗僅販售貓生肖而無兔子生肖。同時期，筆者於附近的福建會館時卻發現，福建會館同時有販售貓及兔子的幸運幣。這是一個頗特殊的現象。或許因為福建會館為華人館裡且臺灣及中國的遊客較多，所以館方特別放置兔子與貓供人選擇。



圖 4、越南特有生肖貓的幸運幣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瓊府會館的文物以光緒年號最多，其次為中華民國及公元紀年。此外，在其香油芳名處發現捐錢的單位包含四個華人會館、禮義學校、嘉應幫及萃先堂。瓊府會館是筆者發現唯一有明鄉萃先堂捐香油錢的華人會館。或許萃先堂就在瓊府會館的正隔壁，基於禮尚往來而捐獻。

以上為以華人的各會館為觀察點的發現。此外，從飲食文化亦可看

出文化接觸的現象。早期由華裔族群帶進會安的飲食譬如「高樓麵」(Cao lầu)及「白玫瑰」(bánh bao & bánh vạc)等均已成為會安當地的飲食文化特產。

「高樓麵」是會安才生產的地方特色麵條，不論在餐廳、路邊攤或市場均可見其蹤影。其來源眾說紛紜，據筆者當地訪問，當代越南人及華人多數不認為高樓麵是他們本族創作的麵條。筆者猜測，高樓麵應起源於明鄉人的飲食。由於年代已久遠，眾人才逐漸遺忘其源頭。筆者於 2014 年 4 月訪問到在會安市場賣高樓麵有名的「左婆」(Bà Trái)的媳婦 N (女，越南人，約 50 歲)。報導人 N 位於會安的郊區的家同時也是製造高樓麵的場所。報導人 N 表示，她先生(姓「謝」)的曾祖父(阿公的爸爸)曾於古城內幫人打工時學會製作高樓麵，後來就一代一代流傳下來。報導人 N 說她先生也是越南人。但因她先生姓「謝」，此姓在越南相當少見，且「謝」姓收錄在萃先堂提供的「明鄉諸族」名單裡面。由此推測，她先生可能是明鄉人後代。因明鄉人通常自認為越南人，故他太太也認為他是越南人。報導人 N 說目前生產高樓麵的除了她家之外，還有幾家也有在做。

白玫瑰在會安的名氣與普遍度雖暫不及高樓麵，但已急起直追。在會安成為國際文化光觀景點之後，由於白玫瑰為會安獨特的地方小吃，加上經營該食品的華人家族懂得結合旅遊，故白玫瑰也成為會安飲食文化的消費特點。據報導人 J (與該家族為姻親關係)表示，白玫瑰的原創者為一位華人婦女 O (80 多歲，越南出生，福建來越第二代，目前已過世)。婦女 O 早期在會安街頭販賣點心白玫瑰。婦女 O 生有 4 男 3 女，其中 1 男 1 女早年夭折。婦女 O 過世後其白玫瑰的食品事業由大女兒及三個男孩子在不同街上各自開店繼承。所以目前在會安所見到的白玫瑰均是由這個家族所生產。經由報導人 J 安排，筆者曾到位於范文同路上的白玫瑰專賣店參觀。該店除了可現場品嚐之外，還有定時表演現做白玫瑰供消費者參觀。當天有七位女性工作人員穿著制服在現場製作。其中除了領班為華人之外，其餘均越南人。我們或許可以想像這些打工的越南人後來有機會自己開店賣白玫瑰。過幾代後白玫瑰就與高樓麵一樣成為華越文化交流下的會安特產。

除了普及度較高的高樓麵及白玫瑰之外，芝麻糊、福建炒米粉、綠

豆沙、豆花、湯圓及甜粿等雖普及度較不高，卻也是會安當地具有華人／明鄉人色彩的飲食。



圖 5、會安古城高樓麵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6、會安古城白玫瑰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五、結語

本論文以會安古城的明鄉萃先堂、福建會館、廣肇會館、潮州會館、海南會館、中華會館及會安傳統市場為主要觀察場域，探討會安市當代明鄉人、華人及越南人之互動關係與文化接觸，以了解明鄉人與華人在越南的本土化過程差異。

基本上，自明末清初以來從中國到越南經商或定居的遷徙是一波又一波的持續過程。隨著定居時間長度的加深，這些移民自然形成舊客與新客的差別。明人剛來越南時為新客，透過通婚與本土化過程逐漸形成舊客的明鄉人認同。這些明鄉人因身分證均登記為越南京族，隨著時間的消逝大部分的明鄉人也忘記自己的明鄉特質而認為自己是京族人。而這也是為何明鄉人的人數越來越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明人之後陸續而來的清人／華人一開始也是新客，與舊客——明鄉人有著不同的族群認同。隨著通婚與本土化過程的進展，這些清人／華人之中也逐漸開始有人成為舊客而有在地認同。在越南的華人與明鄉人認同案例中，通婚、語言及誘因是三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素。「華越通婚」及「越語是否已成為母語」為明人／清人／華人轉變為明鄉人的客觀必要條件。誘因是強

烈影響新客加入明鄉人認同的重要催化劑。誘因包含了經濟與政治層面。以經濟為例，那些經濟普通或不好的新客為了減少稅賦的負擔，故選擇加入明鄉行列。又由於明鄉人被視同越南人，具有報考公職的資格，故不少生活條件不如那些富商的新客當然選擇加入明鄉人以爭取改善自己社會地位的機會。目前，仍居住在會安的華人大約都是第三、四代。會安的華人目前正在經歷從新客過渡到舊客、明鄉化的過程當中。以目前華越通婚及越語母語化相當普遍的明顯現象來看，會安華人的越南化速度應該會持續加速。華人在越南化的過程中，當然有些華人文化也會被保留下來成為其文化接觸下的華越特色，如同高樓麵及白玫瑰成為會安的特產一般。

參考文獻

• 中文

- 李慶新。2009。〈越南明香與明香社〉。《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0：205-223。
- 許文堂。2012。〈華人與中越地區的開發：以會安的歷史變遷為中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亞太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12月20日。
- 許文堂、謝奇懿編。2000。《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依據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版本精選整理）。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 郭振鐸、張笑梅。2001。《越南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陳荊和。1957。〈17、18 世紀之會安唐人街及其商業〉。《新亞學報》，3(1): 273-332。
- 。1960。〈清初鄭成功殘部之移殖南圻（上）〉。《新亞學報》，5(1): 433-459。
- 。1964。《承天明鄉社陳氏正譜》。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1965。〈關於「明鄉」的幾個問題〉。《新亞生活雙周刊》，8(12): 1-4。
- 。1968。〈清初鄭成功殘部之移殖南圻（下）〉。《新亞學報》，8(2): 413-485。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8。《越南華僑志》。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黃蘭翔。2004。〈華人聚落在越南的深植與變遷：以會安為例〉。《亞太研究論壇》，26: 154-191。

葉傳華。1962。〈會安埠今昔〉。《遠東日報》，日期不詳。

劉陳石草。2013。《越南會安華人的族群認同：以羅、葉、劉三大家族為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蔣為文。2013。〈越南的明鄉人與華人移民的族群認同與本土化差異〉。《臺灣國際研究季刊》，9(4): 63-90。

鄭永常。2013。〈會安興起：廣南日本商埠形成過程〉。發表於國立成功大學主辦「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11月29日。

鄭瑞明。1976。《清代越南的華僑》。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譚志詞。2005。〈越南會安唐人街與關公廟〉。《八桂僑刊》，5: 44-47。

• 日文

藤原利一郎。1949。〈廣南王阮氏と華僑：特に阮氏の對華僑方針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0(5): 378-393。

_____。1951。〈安南阮朝治下の明郷の問題：とくに税例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1(2): 121-127。

_____。1976。〈明郷の意義及び明郷社の起源〉。《東南アジア史の研究》，頁 257-273。東京：法蔵館。

• 英文

Mio, Yuko. 2008. Sojourning and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A Case Study from Hoi An, Vietnam. Pp. 1-17 in Yuko Mio, ed., 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系住民の土著化・クレオール化についての人類学的研究.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erizawa, Satoshi. 2007. The Fujian Chinese and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Pp. 65-75 in Yuko Mio, ed. *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and Local People: Case Studie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Wheeler, Charles. 2003. A Maritime Logic to Vietnamese History? Littoral Society in Hoi An's Trading World c.1550-1830.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Seascapes, Littoral Cultures, and Trans-Oceanic Exchanges, February 12-15,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 越文

Chen, Ching-ho (陳荊和). 1960. Mấy điều nhận xét về Minh-hương-xã và các cổ tích tại Hội-an (1/2) (關於會安明鄉社與古蹟的一些看法). *Việt-Nam Khảo- Cổ Tập San*, 1: 1-33.

Chen, Ching-ho (陳荊和). 1962. Mấy điều nhận xét về Minh-hương-xã và các cổ tích tại Hội-an (2/2) (關於會安明鄉社與古蹟的一些看法). *Việt-Nam Khảo- Cổ Tập San*, 3: 7-43.

Đặng, Thanh Nhân (ed.). 2010. *Minh Hương Gia Thạnh Di Tích Lịch Sử - Văn Hóa* (明鄉嘉盛文化歷史遺跡). BQT Hội Đình Minh Hương Gia Thạnh.

Lý, Thành Ý (李誠意). 1880. *Bảng Phổ Đồ Hương Hiền của Tụy Tiên Đường* (萃先堂前鄉賢譜圖板)(Trans., Tống Quốc Hưng). Publisher: Unknown.

Tổng Cục Thống Kê. 2010. Báo cáo kết quả chính thức tổng điều tra dân số và nhà ở 1/4/2009 (2009 年全國人口及住屋總調查報告). <http://www.gso.gov.vn/default.aspx?tabid=403&idmid=2&ItemID=9782>

Trần, Trọng Kim. 2002[1921]. *Việt Nam Sử Lược* (越南史略). Hà Nội: NXB Văn Hoá Thông Tin.

Trần, Văn An, Nguyễn Chí Trung, and Trần Ánh. 2005. *Xã Minh Hương với Thương Cảng Hội An Thế Kỷ XVII-XIX* (17~19 世紀的明鄉社與會安港). Quảng Nam: Trung Tâm Bảo Tồn Di Sản-Di Tích Quảng Nam.

Trương, Duy Hy. 1999. Sự hình thành và đóng góp của làng Minh Hương cổ trong đô thị cổ Hội An ngày nay (會安古城內明鄉社的形成與貢獻). Bài báo cáo tại Hội Thảo Khoa Học về Vài Trò Lịch Sử của Xã Minh Hương. Hội An: Trung Tâm Quản Lý Bảo Tồn Di Tích Hội An.

Trương, Hữu Quỳnh, Đinh Xuân Lâm, and Lê Mậu Hãn. 2006. *Đại Cương Lịch Sử Việt Nam Toàn Tập* (越南歷史大綱全集). Hà Nội: NXB Giáo Dục.

Contemporary Interactions and Cultural Contacts among Minh Huong People, Ethnic Chinese and Vietnamese in Hoi An Ancient Town of Vietnam

Wi-Vun Chi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urveys contemporary interactions and cultural contacts among Minh Huong people, ethnic Chinese and Vietnamese through field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centered on Tuy Tien Duong, Quan Cong Temple, Hokkien Assembly Hall, Quangdong Assembly Hall, Teochew Assembly Hall, Hainan Assembly Hall, Chinese Assembly Hall, and Hoi An traditional market in Hoi An Ancient Town, Vietnam. In general, Minh Huong people completed the process of indigenization through intermarriage. They identify themselves as Vietnamese instead of Chinese. In contrast, ethnic Chinese are more likely to maintain their ethnic Chinese identity. During cultural contacts, Minh Huong people and ethnic Chinese we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local Vietnamese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ethnic culture has also remained in the local culture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Vietnam, Hoi An, Minh Huong, ethnic Chinese, cultural contact